**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粤港抗战文化史论稿/袁小伦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8
ISBN 7-218-04986-9

**Ⅰ．粤… Ⅱ．袁… Ⅲ．①抗日战争-文化史-广东省②抗日战争-文化史-香港 Ⅳ．**K265.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8478 **号**

| | |
|---|---|
| **责任编辑** | **倪腊松 崔肇钰** |
| **封面设计** | **方 雷** |
| **责任技编** | **黎碧霞** |
| **出版发行** | **广东人民出版社** |
| **印 刷** | |
|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
| **印 张** | |
| **插 页** | 2 |
| **字 数** | 250 **千** |
| **版 次** |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 - 2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218-04986-9/K·981 |
| **定 价** | 20. 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 - 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 83791084 020 - 8379472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粤港抗战文化史论稿

袁小伦　著

# 引言

近年来，学术研究已日渐成为知识群体赖以立言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学界同仁的辛勤努力，所谓学术的空白点也越来越少。众所周知，开放背景下学术领域中的竞争，更多体现在研究程度的深浅、研究成果的多少和研究手段的不同。

学界对中国抗战文化的研究正是这样。不过就我阅读范围内的相关学术成果而言，还是全国性宏观的研究比较多，在这些宏观叙事中粤港抗战文化所占的分量与其真实的历史依然不相称。粤港抗战文化研究得还很不够，尽管有过一批专门瞩目于粤港战时文化的广东、香港、四川和北京等地的学者，他们的相关成果也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也尽管有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批党史人征集到不少相关史料，使包括本书在内的一些涉及战时文化的学术著作免于成为空中楼阁。

以“粤港”这一地域性定语开篇的抗战文化研究其实蕴含着全局性价值的学术内涵。粤港地区是战时中国文化长链条的关键一环。粤港地区既是中国战时文化中心区之一，也是战时中国一个政治上最具多样性的地区。《粤港抗战文化史论稿》其实就是笔者在做过长时间的力所能及的梳理之后，力图以中共党史、统一战线史、新文化史和文化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的视角，对粤港战时文化史料进行探讨和研究的几点心得和体会。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粤港抗战文化运动自始至终无不深深打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烙印。“统一战线与文化阵地”一题，分析了抗战初中期，中共如何审时度势地运用统战策略，分别在广州、曲江、香港等地建立和掌握了一系列抗日文化阵地，为粤港抗战文化高潮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说明粤港抗战文化阵地既是统一战线产物又具有统一战线形式的历史特性。

战时文化服务于战争。抗战文化服务于抗日战争，是教育和动员中国人民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力量。战争时期，文化就是宣传。抗战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抗战文化阵地就是这种统一战线的宣传工具。“文化阵地和抗战宣传”一题，叙述了有着统一战线形式和特色的文化阵地如何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说明文化人以笔为枪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各种文化阵地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活动，强调这种宣传为促进国共合作和维护团结抗战等方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中国抗战文化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最显著的特点，是战争打破了文化原有的运动形式并被纳入战时体制。战争成为制约一切的时代枢纽。“战争进程·文化人流聚·文化中心”一题，阐述了粤港抗战文化运动的产生、发展、衍化轨迹同样有着同战争进程相始终的特性。由于战时战区分割的态势，全中国抗战文化运动是呈现区域性分布状态的，战时粤港文化也具有这种区域性展开的特点。文化运动的主体是文化人。粤港抗战文化之所以具有区域性展开的独特形态，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战争影响下文化人的流聚。战局的区域性展开和文化人的流聚，导致了战时粤港文化运动先后形成广州、曲江、香

港、东江四个文化中心点。同时指出，战时文化人流聚也证明了粤港抗战文化的勃兴是本土和外来两股文化力量汇聚和整合的结果。

文化人问题是关系到革命事业的成败兴衰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战时中共与留港文化人”一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与战时留港文化人的关系，重点研究了周恩来、中共中央南方局如何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驻港机构领导和影响香港文坛——审时度势转移文化人到港，理解和尊重文化人的特殊心态，妥善调和种种矛盾和论争，最广泛地团结文化人，掀起香港新文化的高潮，并在香港沦陷后又如何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文化人——树立了一个文化统战的范例，在中国革命史和统一战线史上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笔。

对外文化宣传是有着特殊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的粤港地区尤其是香港的抗战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沦陷前香港的涉外文化宣传”一题，从三个层面论述战时香港进步文化界如何利用各种文化阵地所进行的涉外文化宣传：为争取外援和对外宣传祖国抗战的真相、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宣传、战时国际政治经济军事述评，并认为这种涉外文化宣传，既争取了国际民主力量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又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外事人才，为战后对外联络和新中国外交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打下了相关的干部基础。

战时粤港地区，除国统区、沦陷区和香港外，还有华南抗日根据地即中共在东江和琼崖等地直接领导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文化建设”一题，思索以东江和琼崖“双璧”为主的华南抗日根据地文化，认为新闻出版、文艺、教育是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三大支柱。一方面分析东江琼崖抗战文化建设的共性，并指出这些共性又是广州、香港、曲江抗战文化所不可能有的；另一方面比较东江和琼崖两地文化建设的差异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指出琼崖抗战文化的本土性、对苏区文化的继承性和东江抗战文化的外来侨寓性、移植性，还有因交通、地理和政治环境的差异造成的东江知名度和影响力比琼崖大。

粤港抗战文化史论有一个总的研究旨趣，这就是力图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原点，通过摆史实讲道理的思路和以历史活动主体即战争状态下流动着的文化人为研究中心的方法，将战时粤港文化放在全民族抗战和全球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论述粤港战时文化成为中国战时文化长链条的关键一段、中国战时文化的中心区和东方反法西斯文化宣传中心之一的历史本相，并希冀在确凿历史事实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历史认识因应一种较新的学术意义，即区域性研究课题也能体现出全局性的价值，以更贴切地表达了史学研究对历史本相的理解和体验，并再现历史广泛而深刻的内在联系。例如，北平、上海沦陷后，广州与武汉一样成为文化中心点。广州、武汉沦陷后，曲江成为一个区域性中心。而香港则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即在上海沦陷后有些文化人和文化机关西迁途经香港时停留下来；广州沦陷后又聚集了一批文化力量；到皖南事变后重庆、桂林等又向香港聚集了力量，而形成一个文化中心。又如，由于战时文化的流动性特征，战时粤港文化人群体的构成自然也突破了原先的地域规范，形成了既与地域有关又打破地域限制的文化人群体组合，显示了在抗战形势下实现统一使命要求而构建起来的新型文化人群体关系，于是战时活动在粤港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大多是全国知名的文化人。

上述粤港抗战文化各题都涉及中国共产党与战时文化的关系。通过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从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领导和影响粤港地区的抗战文化事业和反法西斯文化事业，为中国现代文化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为夺取中国民族解放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展现了战时中国共产党的宽阔的文化

胸怀、正确的战时文化政策、对文化人的热诚关照、丰硕的文化成果等等。粤港抗战文化历史图景的展示，具体而多彩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战时是如何谱写这一动人的历史篇章的。因此，今天研究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将大有益于改善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事业的领导，继往开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谨以此书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

# 统一战线与文化阵地

1941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时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①]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粤港抗战文化运动自始至终无不深深打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烙印。粤港抗战文化阵地既是统一战线的产物，又具有统一战线的形式。本题主要分析在抗战初中期，中共如何审时度势地运用统战策略，分别在广州、曲江、香港等地建立和掌握了一系列抗日文化阵地，为粤港抗战文化高潮的兴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一、广　　州

抗战全面爆发后，广东的政治形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广东民众抗日情绪高涨，中共在广东政治影响增强，派系复杂的国民党广东当局也凸显出某种“开明”倾向。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广东民众救亡运动在屡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尤其是 1936 年初“荔枝湾惨案”后转入低潮。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广东民众被压制的抗日怒火终于像火山爆发一样，燃起空前猛烈的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熊熊大火。当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各界群情激愤。12 日，广东八和粤剧协进会在海珠戏院义演筹款劳军。15 日，中山大学、广雅中学、市一中等广州主要大中学校爱国师生发出声援卢沟桥中国驻军抗战的通电。17 日，广东各界联合举行广东民众御侮救亡大会。20 日，广州医务工作者组成北上救护大队出发华北前线。25 日，爆发了广州各界群众 15 万人参加的御侮救亡示威大游行，要求当局开放民主，允许民众自行组织武装抗敌，打破“党禁”，一致对外。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面抗战路线，坚决支持和正确引导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迫切愿望，因而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戴，其政治影响也随之不断增强。粤港大报如《大众日报》、《珠江日报》、《广州日报》等，开始经常转载中共的文件、报道有关陕北边区的消息。广州市内一些学校公开悬挂中共领袖毛泽东、朱德的画像。而在十年内战中遭破坏的中共广东组织，自 1936 年夏由中共北方局派来的薛尚实、王均予在香港、广州秘密建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州市委开始活动以来，到卢沟桥事变发生时，也已有一年之久。这期间建立的秘密组织如学联筹备会、救亡先锋队、民族解放先锋队小组等和受中共影响的文化团体如救亡歌咏团、艺术工作者协会、锋社、蓝白剧社，以及各种读书会、研究会，在卢沟桥事变后日益活跃起来。一批受中共政治影响的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在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也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积极寻求中共的组织领导。

与此同时，尽管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国民党广东当局上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统治集团内部依旧派系纷争，异常错综复杂，但大多数头面人**




广州街头的抗日宣传画

物摆出了开明姿态。其原因和目的，一方面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他们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顺应民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则是企图利用民众的抗日情绪笼络人心，争取群众，以巩固和扩大本派系的地盘和势力。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却是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的。

自 1936 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倒台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势力涌入广东，从而形成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尖锐对立。而无论中央派系还是地方派系，本身又是派系林立。以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掌握着七八万军队和全省的基层政权，视广东地盘为命根子。在日寇南侵威胁和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为利用民众力量守土卫乡，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开放民众运动的政策；鉴于中央势力在广东迅速增长，又企图联合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政治力量与之抗衡。因此，余汉谋及其主要将领李煦寰等都表示赞成统一战线，倡办民众抗日团体，启用左派进步分子。

国民党中央派系势力，掌握了广东党务财政大权和特务组织，是蒋介石安插在广东的嫡系力量。以陈宗周、方少云的复兴社势力，对中共和进步势力持敌视态度，对统一战线和民众运动经常加以阻挠。他们凭借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的招牌，企图一手控制群众运动，经常造谣生事攻击中共，属于国民党顽固派势力。CC 系势力为了同地方实力派争夺群众，则摆出开放民主的进步姿态，如省党部常务特派员兼广州市长曾养甫政治上是国民党亲英美派人物，主张联共抗日。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是曾养甫手下的得力干将，早年曾参加周恩来领导的觉悟

社，又为 1936 年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奔走过。他公开赞成统一战线口号，积极倡导民众运动，成为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激进人物代表。

此外，以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为首的政学系，周旋于地方实力派和中央势力之间，对开放民众运动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以省党部特派员钟天心为首的孙科系，投靠地方实力派，公开推进民众运动，且在文化界有一定影响；以李伯球为首的第三党，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极深，表示愿为中共作桥梁，在民众运动与中共合作。[②]




《救亡呼声》第一卷第二期封面

仍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共广东有关组织，根据上述政治形势变化和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针对中共在广东文化界和学生界有一定群众基础但仍旧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大规模领导各界人民参加抗战的要求的情况和具有“开明”倾向的广东当局某些激进人士正在寻找进步力量并把目光移到文化界的动态，运用正确的上下结合、秘密公开配合的统战策略，终于导致了一个国共合作的广东抗日救亡运动首先从文化界和学生界冲开缺口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救亡呼声社的诞生。

卢沟桥事变一爆发，谌小岑便布置其下层人员邓明达、卓炯（均为进步青年，不久后加入中共）等酝酿筹组广东救亡同志会，以作为自己“施展抱负”和掌握文化界的公开组织。邓、卓分别与中共党员吴华（吴济生，后任中共广东省委青委负责人）、虞焕章（杨康华，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长）

联系，并请求帮助。中共即在文化界、教育界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参加，并对筹组工作予以指导。1937 年 7 月 18 日，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青年在广州西湖路“乾庐”举行大会，宣告成立“广东青年救亡同志会筹备会”，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强行压制，被迫在一周后宣告流产。他们怒火满腔，不肯散伙。谌小岑为他们的爱国热情所鼓舞，宣布筹办《救亡呼声》旬刊，以谌小岑、瞿绥如（以上国民党员）、黄泽成、容惠兰（以上中共党员）、邓明达、卓炯、何希齐（进步青年，不久加入中共）组成编辑委员会，并在省党部立案注册；同时成立青年救亡工作座谈会，以联络这批进步青年。中共积极推进《救亡呼声》的筹备出版和座谈会的工作，并通过邓明达向谌小岑转达中共的意见。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中共有关组织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即通过参加座谈会的党员向谌小岑建议，成立一个以《救亡呼声》旬刊为名称的文化团体救亡呼声社。8 月 14 日，救亡呼声社在座谈会的基础宣告成立，选举谌为社长，邹优瑞（中共党员）、黄泽成、邓明达分别为总务部、研究部和出版部主任。机关刊物《救亡呼声》旬刊也于 8 月 21 日创刊发行。该社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运用统战策略在广东与国民党合作建立的第一个群众团体，其政治成分包括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由于中共在该团体中起核心和领导作用，谌小岑本人被国民党顽固派攻击为“共产党的书记长”[③]。

同年 9 月，中共中央任命张文彬为中共南方工委（1938 年 4 月改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并要求他到广东完成“发展组织力量，发展统一战线，建立抗日团体，推动国共合作”[④]四大任务。张文彬结合广东实际政治环境，总结广东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包括救亡呼声社建立在内的实际经验，确定了运用统战策略，进一步打开文化统战缺口，以完成中共中央所赋予的使命的新方针。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

尽管事实上已经形成国共合作的局面，但国民党仍然实行所谓“防共、限共、溶共”政策。在广东，国民党当局更是始终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公开表示“在广东因为国际关系（指英、法）不能允许党的公开活动”。有鉴于此，南委确定了“积极参加当局所号召的群众运动与一般救亡工作”，“潜入到一切群众组织与工作中去”，以期“更好地隐蔽的发展”的步骤：策略上注意“依靠左翼分子与非正式公开的党员而又在群众中较有影响地位的同志”，“与较开明的余汉谋、谌小岑、左恭、钟天心等靠拢”，“并充分利用省党部的关系打开局面”。[5]与此同时，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和八路军代表廖承志、潘汉年、张云逸、云广英则利用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广东地方实力派进行大量统战工作，掩护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开展活动。

对于建立和占领文化阵地方面，中共则采取“不建立独立领导的团体而积极潜到人家团体中去作，使得无形中这种团体掌握在我们手中”[6]的做法。在策略上，着重对余汉谋、李煦寰、谌小岑、钟天心等人主办的团体予以大力支持；对陈宗周等国民党顽固派，则利用各派系互相争夺群众的矛盾，迫使他们不得不为抗日文化运动出钱出力。有关组织先后动员和组织了大批党员和进步文化人、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国民党当局主办的文化团体，以公开合法的方式进行群众工作，在实际工作中夺得了各文化阵地的领导权。因为国民党上层人士虽然占据了有关文化团体的领导权，但他们向来脱离群众，不可能真正掌握群众力量。真正起骨干作用的，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文化人、青年学生。所以，这些团体名义上是国民党主

持，实际上为共产党所掌握。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简称“广州学抗”）就是一个例子。“广州学抗”原名广州学生抗敌后援会，成立于1937年3月。同年7月改名广州学生抗敌救亡会，由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主办，陈宗周主持。中共广州市委在卢沟桥事变前曾秘密建立广州地下学联。卢沟桥事变后，市委改变了策略，原有的地下学联不再活动，转而利用“广州学抗”的合法名义进行学生工作。从1937年暑假开始，市委先后派学生党员陈能兴、陈恩、吴凤珠、周羡芬、黎良志、陈良堡、朱荣等，积极参加“广州学抗”活动，逐渐在“广州学抗”理事会占了优势，掌管了其中的宣传、组织等主要部门负责职务。陈能兴当选为“广州学抗”常委，经常周旋于陈宗周等头面人物之间，对他们施加影响。到1937年底，“广州学抗”名义上还是陈宗周主持，而实际工作已为中共所掌握。市委在其中建立了由陈能兴任书记的地下支部。

中共就是这样占领了抗战初期广州地区的主要文化阵地的。除上述的救亡呼声社和广州学抗外，中共占领的文化阵地主要有：抗战教育实践社、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群众团体，《新战线》、《抗战大学》、《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广州分馆等舆论阵地（《武装》、《抗战戏剧》、《劳动周刊》、《铁血》、《抗战农村》、《抗战华侨》等报刊也受到中共的影响），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四战区政治部第三组、四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等国民党军队文化机构。此外，中共还掌握了锋社话剧团、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艺协剧团、广州儿童剧团等。

抗战教育实践社　1937年秋，广州文化界组织了众多不同形式的座谈会。为建立华南抗战教育网，中共联合第三党发动，由国民党省党部出面，于同年11月21日，在文化界各种座谈会的基础上，成立抗战教育实践社。该社由钟天心任常务理事，理事有岭南大学校长李应林、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黄元

彬、中山大学教授朱伯康和尚仲衣（1939 年初加入中共），还有缪培基、黄中廑、刘石心、叶兆南（孙大光，中共党员）等，理事会下设社务部、教务部、训练部、出版部和编译委员会，社员有 1000 多人。实际工作由著名教育家尚仲衣主持，中共党员叶兆南、石辟澜、梁威林、陈文信、刘向东等均为该社的主要骨干。该社的主要活动是培训社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先后举行多期培训班，培训学员 2000 多人。1938 年，该社组织流动工作团，由中共党员刘向东率领，活动于中山、东莞等地，以文艺形式宣传抗战。中共在该社成立以徐侠梅为书记的党支部。该社的成立推动了广州教育界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华南战时教育的开展。

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　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一些文化团体的建立，上海等地文化人和留学生来到广州，成立一个全省性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不仅是形势的需要，而且条件也已经成熟。经中共暗中策划，救亡呼声社、平津同学会、留东同学会等团体的成员磋商，于 1937 年 11 月 14 日召集了教育、新闻、文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头面人物以及广东当局上层人士共 100 多人举行座谈会，通过组建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决议，推举谌小岑、钟天心、欧阳山、虞焕章、龙世雄、古子坚、蒲风等 15 人组成筹备委员会。12 月 25 日，广东文化界救亡协会隆重宣告成立（1938 年 2 月改为广东文化界抗敌协会），2000 多人出席成立大会，选举了由钟天心、谌小岑、欧阳山、虞焕章、李伯球、叶兆南等 32 人组成的，包括国共两党、第三党、无党派人士及广州各文化团体负责人和知名文化人组成的理事会。中共实际掌握了该会工作，例如吴华负责组织部、欧阳山和虞焕章掌握宣传部、邓明达掌握总务部、叶兆南负责研究部。该会以“动员一切文化工作者，在政府的领导下，建立文化国防，争取民族解放胜利”为宗旨，是广东文化界最大、最具影响力的组织。该会的诞生，引起各方面

的巨大反响。它和先行成立的广东戏剧协会一道，带动了广东文学会、华南绘画界救亡协会、歌咏团协会、广东新闻界从业员抗敌协会、社会科学工作者抗敌协会等文化界救亡团体的成立，从而起到组织广大文化工作者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⑦

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简称“广州学联”）在中共南委青年运动委员会秘密组织下，1937 年 12 月 9 日，以救亡呼声社、平津同学会、中山大学为核心，联合 20 多个文化、教育团体共 5000 多人，举行一二·九运动两周年暨欢迎上海文化人来粤大会。郭沫若、章乃器等知名人士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书记长谌小岑、广州市党部书记长陈宗周等上层人物都出席大会。南委青委负责人吴华以救亡呼声社成员身份发表讲话，提出“巩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学生统一战线”的号召。谌小岑在大会“训话”中对大会产生的广州学生抗敌联合会筹备会表示支持；陈宗周开始比较顽固，但由于在会后举行的标志着广东学生运动从分散走向统一的示威游行中看到青年学生的热情和力量，也只好对筹备会表示支持并同意学联正式成立时可到市党部备案。12 月底，广州学联正式诞生。该会是广州学生的统一组织，包括了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岭南大学、勷勤大学等 30 多间大中学校、团体，以“团结全市同学，集中全市学生救国力量，拥护政府抗战到底，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解放”为宗旨。该会的干事会基本由中共原“学联筹备会”成员组成。



2000 年立春，作者采访欧阳山。同年 9 月欧阳山去世，享年 92 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